

国际移民视阈下移民动因理论再建构*

章雅荻 余潇枫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口流动的模式逐渐由以往单一的“外流”或“回流”的线性模式转变为循环往复式穿梭于各国的“环流”模式。人口跨国流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移民理论的多样性，我们难以用一种理论、一种视角解释其动因。跨学科的国际移民理论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自发性人口流动的交互性与多面性。本文试图批判性地审视现有的移民动因理论，并在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公共政策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基础上，从整合的视角探讨移民流动的内隐性、外显性和干预性三大动因。最后，本文在三大动因基础上构建了“IPIS模型”。对移民动因理论的再建构不仅有助于我国遵循人才流动的规律、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人才流动机制，也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对话。

关键词：国际移民 环流 人才 移民管理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20)01-0119-137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界限和地理距离的存在意义不断被弱化，人口的跨国流动逐渐由以往单一的“外流”或“回流”的线性模式转变为循环往复式穿梭于各国的“环流”模式。这种“环流”模式有助于推动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流动。随着移民跨国流动日益频繁，移民受到的影响因素也越来越复杂。国际移民的动因理论从不同的学科出发，勾勒出国际移民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移民环流的形成机制和根本动因。

* 文章的完成得益于很多人的慷慨帮助，他们或多次为文章提出修改意见，或为文章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作者向他们的慷慨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特别感谢赵立新教授的细心指导以及陈光照同学的帮助。作者也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极富建议性的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现代意义上的移民研究最早起源于欧内斯特·莱温斯坦 (E. G. Ravenstein)。经过百年的发展,移民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交织互动的领域,跨越了人口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人口学通过量化的方式研究移民对人口数据的影响;人类学重点探讨移民族群的文化冲突、融合以及认同等问题;历史学侧重于分析人口迁移的过程,梳理移民的历史变迁;经济学倾向于解释人口迁移的动因以及移民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法学着眼于检视各国法律、法规对于移民的控制及其可能引发的国际移民问题;社会学则重点考察移民社会的构成以及移民群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政治学关心“弹性公民”^①的社会事实以及作为移民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新形势下,“环流”的趋势对现有的移民动因理论形成了新的挑战。经典的移民动因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移民网络理论、累计因果关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移民系统理论)仍以从南到北、一次性、永久性的线性迁移模式为研究对象,但其解释力随着“环流”的趋势增加而不断受到严重削弱。新兴的“环流”动因理论尽管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人口环流产生的原因,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有些理论不仅抽象而且概括程度不高,不具有指导作用;有些理论具有学科的狭隘性,局限性较大;有些理论仅仅停留在经验性的观察上,只是对实事做出解释。目前,尚未有一个理论模型能够将不同角度、不同学科有机地综合起来对新形势下移民流动的动因和流动的深层机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解释。

本文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公共政策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对人口跨国流动、迁移动机的研究,提出内隐性、外显性和干预性三大动因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IPIS (Identity-Policy-International Situation, 认同—政策—国际形势)模型”,从而最终形成一种总体性的解释,以帮助我们在新的移民流动趋势和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竞争现状下,了解移民形成的动因并遵循其规律加以应对。

^① 王爱华提出,部分香港人面对不断变动的政治、经济环境,采用了持多国护照、在多个国家留有资产、建立多国商业联系以及频繁的跨国旅行等文化逻辑和策略。参见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二、“环流”——国际移民的新趋势

“环流移民”并非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博芬柯克（Frank Bovenkerk）就提出“环流移民”是指前往一地或在两地之间流动的移民，包括两次或两次以上回到自己祖籍国的人。^①随后，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国际组织对于“环流移民”的定义展开了相关讨论。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来自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院（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其在2003年提出“环流移民”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多次返回祖籍国的人。与短期移民不同，“环流移民”强调的是在原籍国与所在国之间经常性的流动。^②2012年，有学者对“环流移民”的定义加上了“以工作为目的”这一限制条件，认为移民在祖籍国和别国间系统性的、常规性的、以工作为目的的流动才能称为“环流移民”。^③法尔格（Philippe Fargues）进一步提出了“环流移民”的六个特征。^④政策层面上，2007年“第一届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GFMD）提出“环流移民”的定义是“国家之间流畅的、与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关且有利于相关各方的迁移，它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永久的。”而国际组织对于这一概念的认可较晚。2010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一份《北非、西非移民与发展》的报告中指出，“环流移民”是一种在自由移民框架下所发生的自发性迁移，在这一框架下，移民工人们可以选择跨境来回流动。^⑤由此可见，“环流移民”属于国际劳动力迁移的一部分，是一种在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合法的、循环的、反复的、自愿的并以工

① Frank Bovenkerk and Research Group for European Migration Problems, *The Sociology of Return Migration, A Bibliographic Essay*,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74, p. 20.

② Newland Kathleen, D. Agunias & A. Terrazas, “Learning by Doing: Experiences of Circular Migration. Insight, MPI,”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Insight*, September, 2008,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research/learning-doing-experiences-circular-migration>,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9日。

③ F. Constant, O. Nottmeyer and K. F. Zimmermann “The Economics of Circular Migratio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Discussion Paper No. 6940, October, 2012, <http://ftp.iza.org/dp6940.pdf>,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9日。

④ Philippe Fargues, “Circular Migration: Is It Relevant for the South and East of the Mediterranean?”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2008, <https://cadmus.eui.eu/handle/1814/8391>,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9日。

⑤ “Making Migration A Development Factor — The Case of North and West Afric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pril, 2010.

作为主要目的的迁移现象。与传统的移民形态不同，“环流”这一新的迁移方式具有动态性、重复性、非永久性、双向或多向性等特点。

“环流移民”最早以短期的国际劳工形式出现。美国在1942年启动了“布雷斯罗”（Braceo）项目，从墨西哥引进短期劳工。在22年期间，美国共引进了450万名劳工。^①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经济复苏与战后重建导致了劳工极度短缺，各国通过不同形式的“客籍劳工项目”（Guest Worker Program）来缓解劳工荒。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新加坡、文莱、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开始从亚洲其他国家招募短期的“循环劳工”或者培训生来弥补本国的劳动力市场空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流移民”的表现形式有所转变。美国率先推出了“H1-B签证”，鼓励高技术人才赴美工作，开启了人才跨国流动的时代。国际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一群在人才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来回流动的高级人才，他们在两国之间传递技术、信息，分享发展红利。学者们将这种“候鸟式”的定期地、频繁地、循环地往返于两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定义为“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②2005年，加州大学的萨克森尼安（Saxenian）教授继续将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一个学术体系。^③

21世纪以来，尽管以低技术劳工为主的传统“环流移民”仍在继续，^④但“人才环流”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人才环流”的类型较多，若按照时间来划分，可以是短期的（小于6个月）或季节性的（6-9个月），也可以是长期的（大于9个月）；按照性质来划分，可以是自发性的，也可以是有组织

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报告：《2010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5页。

② Johnson M. Jean and Regets C. Mark,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Brain Drain or Brain Circulation?” *Issue Brief*, June 22, 1998,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422166.pdf>, 登录时间：2019年10月9日。

③ Saxenian Lee Anna,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Circul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Regional Upgrading in India and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40, No.2, 2005, pp. 35-61.

④ 比如，2003年，加拿大政府分别与墨西哥政府和危地马拉政府签订了正式的双边协定，开启了季节性农业劳工项目；意大利政府于2003年和2011年分别与摩尔多瓦政府签订了正式的双边协议来弥补自身劳动力市场的空缺；2007年，新西兰政府启动了许可季节性雇主项目（Recognized Seasonal Employer, RSE），引进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农业工人；2009年，荷兰启动了“蓝鸟”项目，引进160名来自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的劳工移民填补本国劳动力市场的空缺。

的。^①“人才环流”的流动模式主要有两国“环流”和三国“环流”两种（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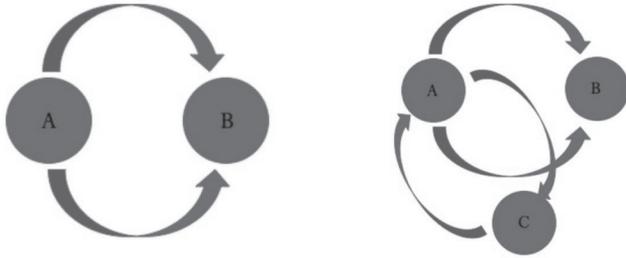


图1 “人才环流”的两种流动模式：两国“环流”和三国“环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005年，在国际移民组织（IOM）和欧盟委员会的多份文件报告中都提到了“环流”与发展的关系，认为人口的跨国“环流”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减少不平等、激励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②2006年9月召开的“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GFMD）的会议报告里指出，“环流”是一项移民来源国与目的国之间互惠互利的政策性安排，我们应该对现有的“环流”项目进行认真评估，促进这些项目最大化“环流移民”的正面影响。^③就目前情况来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环流”是一种国际移民共赢模式的新趋势，既能最大化接受国、来源国和移民自身的收益，又能最小化国际人口流动的代价。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演化，“环流移民”的主体逐渐由原先的低技术劳工转变为现在的高技术人才，其形式也由原先的有组织的低技术劳工“环流”转变为现在的自发性的高端人才“环流”。“人才环流”不仅能在一种灵活

^① Piyasiri Wickramasekara, “Circular Migration: A Triple-Win or a Dead End,” *ILO Discussion Paper*, No. 15, 2011, p. 17.

^②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5: Costs and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Communication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5; “Policy Plan on Legal Migrati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Dec. 21, 2005;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Some Concrete Orientation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Sep. 1, 2005.

^③ Magdalena Privarova and Andrej Privara, “Circular Migration and Its Impacts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 Science Education*, Vol. 11, No. 18, 2016, p. 12912.

开放的环境下同时惠及各个主体，还改变了移民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利益对立状态，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

三、现有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在新的迁移方式出现后，学术界以“回流”和“环流”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新的概念、模型和分析框架，试图重新理解人口迁移的复杂性、交互性、情境性以及多面性。^①总体来讲，这些理论为“回流”或“环流”的动因提供了五种解释模式。第一种是市场决定模式，强调经济理性影响迁移行为。^②该模式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经济移民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环流”是在个体理性选择下做出的决定，目的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施密特（Schmitt）和苏贝朗（Soubeyran）指出：个体通过不断的流动使得自身的效用、收益最大化，具体来讲，个体倾向于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③在该模式下，经济水平与市场环境在移民流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④原籍国的经济发展、就业形势、投资环境、^⑤国内生产总值（GDP）、^⑥总体工资收入水平^⑦等都将直接影响移民是否选择“回流”。市场决定模式的缺陷在于将移民视为完全理性的个体，把“回流”的动因简单地抽象化为经济因素，忽

① 吴越菲、文军：《新流动范式：当代移民研究的理论转型及其论争》，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7期，第79-88页。

② Herzog W. Henry and Schottman M. Alan, "Migration Information, Job Search and the Remigration Decisi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50, No. 1, 1983, pp. 43-56; Borjas J. George,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2, No. 2, 1994, p. 1686; Reyes I. Belinda, *Dynamics of Immigration: Return Migration to Western Mexico*, California: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1997. https://www.ppic.org/content/pubs/report/R_197BRR.pdf, 登录时间：2019年10月9日。

③ 林琳：《智力环流——人才国际流动“共赢”模式的新探索》，载《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25-31页。

④ 王晓莺：《海外华人专业人才回流态势》，载《人才开发》，2004年第1期，第31-33页。

⑤ Christian Dustman and Y. Weiss, "Return Migration: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K,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45. No.2, 2007, pp. 236-256.

⑥ 孙健、纪建悦、王丹：《海外科技人才回流的规律研究》，载《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8期，第6-10页。

⑦ 张再生：《中国的智力回归及其引进机制研究》，载《人口学刊》，2003年第6期，第21-25页；许家云、李淑云：《基于CES生产函数模型的海外人才回流问题研究》，载《中国科技论坛》，2012年第12期，第102-106页。

视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同时，该模式在研究路径和范式上也没有超越经典的移民动因理论。

第二种是以跨国主义理论为代表的认同导向模式。该模式采用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中心的新范式，强调多样性认同与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将移民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语境中。跨国主义理论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跨越两个甚至多个国家。该模式认为移民认同的双重性和多重性是移民循环流动的重要原因。^①在跨国主义的视角下，跨国移民的认同是动态的，可以自我改变和重构的。他们在多种文化之间进行着有效转换，不断整合、吸收多种文化规范并加以内化后形成新的“趋同性”认同。认同导向模式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改变了传统的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的移民理论研究，但该模式通常用来描述移民与“回流地”的联系而不是解释“回流”动因。

第三种是情感驱动模式。该模式从个体视角出发，认为移民的“回流”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或价值取向，^②而且个人的情感因素在海外移民选择“回流”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③移民与国家产生的情感程度的不同也会决定他们对迁移模式的选择不同。^④有学者认为“回流”移民在情感上对祖国更加依恋，而永久性移民则对自己所在国更为依恋。^⑤情感驱动模式的不足在于忽视了迁移行为具有理性的一面，且其假设并不适用于所有移民群体，这使得该理论的解释力受限。

第四种是政策激励模式。该模式认为简单的“推拉模型”已经不能解释“环流”，更重要的驱动力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制度环境，如国家的移民法、海外招聘政策、移民政策、签证制度、^⑥劳工政策、政府的经济政策影

① Schiller Glick Nina, Basch Linda and Blanc-Szanton Cristina,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645, No.1, 1992, pp. 1-24.

② 张振：《中国人才流散与回流问题探析》，载《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83-86页。

③ 何敏、于天祚：《情感因素对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回流的影响研究》，载《大学教育科学》，2018年第4期，第65-69页。

④ Graeme Hugo,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A Discussion Based on Indonesian Experience," in P. A. Morrison, eds., *Population Movements: Their Forms and Functions in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rdina Editions, Leige, 1983, pp. 69-113.

⑤ Ibid., pp. 69-113.

⑥ E. Kalipeni, L. L. Semu & M. A. Mbilizi, "The Brain Drain of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from Sub-Saharan Africa: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12, No. 2, 2012, pp. 153-171.

响、^①科技政策^②以及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影响等。^③甚至针对签证的有关审核程序的低效都有可能阻止高技术劳动力的环流。^④相反,客观、公正的政治文化,公平的升迁程序会提升高技术人才“环流”的可能性。崔大卫(David Zweig)以中国的高技术人才“回流”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给予“回流”的专家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简化回国签证流程,开放短期访问等,这些措施都推动了人才的“回流”。^⑤但该模式只是从经验性的观察出发,并未对政府政策进行详细的分类与总结,因此,该研究仅停留在描述性阶段,抽象概括程度不高,不能指导具体研究项目。

第五种是综合影响模式。该模式将移民流动的原因纳入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中,认为迁移的动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个人因素(学术职业发展)、制度因素(人力资本结构)和政策因素(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等,^⑥因而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安德烈斯·索利马诺(Andres Solimano)将国际人才流动的基本原因归于七个方面,分别是收入差距、个人价值追求、国家发展需求、技术革新、产业聚集化、语言文化适应和移民政策。^⑦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改善人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人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和渠道可以促进人才流动,^⑧尤其是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大、移民自由流动的障碍减

① S. Mahroum, “Highly Skilled Globetrotters: Mapping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Human Capital,” *R&D Management*, Vol. 30, No.1, 2000, pp. 23–31.

② Nancy Gore Savaria and Juan Francisco Miranda, “Plumbing the Brain Drain,”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 82, 2004, pp. 608–615.

③ Varma Roli and Kapur Deepak,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ain Drain, Brain Circulation and Brain Retain: A Case Study of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Vol. 15, No.4, 2013, pp. 315–330.

④ K. R. Matthews and N. Lane, “Science Collaboration Across Borders,” *Baker Institute Policy Report*, Vol. 42, No. 2, 2009, pp. 1–7.

⑤ Zweig David, “Competing for Talent: China’s Strategies to Reverse the Brain Drain,”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145, No. 1, 2006, pp. 65–90; 崔大卫:《留学与海规背后的制度变迁》,全球化智库, <http://www.ccg.org.cn/Effect/View.aspx?Id=9082>, 登录时间:2019年10月4日。

⑥ 黄海刚:《从人才流失到人才环流——国际高水平人才流动的转换》,载《高等教育》,2017年第1期,第90–97页。

⑦ 戴长征、王海滨:《国际人才流动与人才安全问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6期,第148–154页。

⑧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 *Poetics*, Vol. 12, No. 4, 1983, pp. 311–356.

少、双重国籍的实施和无国界职业概念的出现等，都使得人才流动现象日益频繁起来。^①还有一些学者将“人才环流”的动因总结为四个制度性因素相融合的综合影响：产业体系、企业跨区域创业和学习、风险投资的可获得性以及国家在促进技术转让上的努力综合影响了“人才环流”。^②也有学者从个体、社会、产业和全球化的角度对“人才环流”现象进行剖析。^③崔大卫以中国的人才政策和海归为研究对象，得出人才自身的职业规划、经济情况、朋友家庭、社会阶层和政治稳定^④与一国的软环境，如法律、文化、人际关系等，^⑤共同影响了人才的跨国流动。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对不同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分析，对其内在的关联性也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仅仅对事实做出解释而尚未形成一种理论框架。

尽管关于移民“环流”动因理论已经形成了丛林态势，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环流”产生的原因及发展机制，但仍然存在不足甚至是严重缺陷，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理论视角缺乏整体性。移民的复杂性与移民研究的跨领域性决定了移民理论的多样性，但也正因为理论视角的分割、学科的多元造成了移民动因理论缺乏整体性研究。第二，忽视了国际环境在“环流”过程中的影响。国际移民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产物之一，在人们流动、迁移的过程中难以脱离国际形势（如政治、经济形势与世界格局的变化等）的影响。第三，对于政府政策的分析不够深入。尽管关于“环流”的研究大多都提到了政策的重要性，可是大多都停留在描述阶段，缺乏理论的提升。第四，与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一样，“环流”理论仍然以西方为中心。虽然中国学者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寻找“环流”的成因，但大多还是以引荐、套用国外移民理论为主，反思国外理论者少，建构新的理论者更

① Tung L. Rosalie, “Brain Circulation, Diaspora,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6, No. 5, 2008, pp. 298–304.

② Chen Yun-Chung, “The Limits of Brain-Circulation: Chinese Returnees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Beijing,” *Pacific Affairs*, Special Issue, Vol. 81, No. 2, 2008, pp. 195–215.

③ 林琳：《智力环流——人才国际流动“共赢”模式的新探索》，载《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25–31页。

④ Zweig David, “To Return or not to Return? Politics VS. Economics in China’s Brain Dra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2, No. 1, 1997, pp. 92–125.

⑤ Zweig David, Chung Siu Fung and Vanhonacker Wilfried, “Rewards of Technology: Explaining China’s Reverse Mi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Vol. 7, No. 4, 2006, pp. 449–471.

少。这种系统性的对于非西方学者的忽视导致了学术界的同一性和对其他文化的排斥性。

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重视对移民动因的理论研究。人口的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移民输出国因人才流失而带来的不利局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理论视角也可以为移民动因理论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我们亟需一个能够整合包容并超越现有的“人才环流”理论框架的新范式，以便将这些理论有机地综合起来，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刻解释“人才环流”的复杂性、交互性和多元性动因。

四、移民动因的“认同—政策—国际形势模型”

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并非是简单发生的，而是被生产和被模式化的。^①“环流”是一种在多元复杂的背景因素之下产生的社会行为。依据事物的成因原理和系统理论，“环流”的动因机制包含三种驱动力：第一种是激发移民产生环流的内在因素——认同（identity）。认同是指人们因内在需求而引起的“环流”意愿，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励力量。认同感既包括对祖籍国的依恋和感情，又包括对目的国的认可与向往。有学者提出移民所带来的新认同会不断挑战、威胁接受国的国家认同，从而带来社会安全问题（societal security）。^②移民虽然生活和工作在某一地方，但当移民原籍国的认同与接受国的认同相冲突的时候，他们“首先认同自己的故乡”，^③甚至有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会把这种“族性认同”发挥到极致。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用“美国马赛克式社会”的概念来说明移民正在使美国的国家认同趋于“碎片化”。^④但从更广的视阈看，跨国移民的认同是在多种文化之间“同步嵌入”且“不断再造”的，^⑤是一种通过自我选择的“非地域性”认同，最后形

① 吴越菲、文军：《新流动范式：当代移民研究的理论转型及其论争》，第79-88页。

② 参见Ole Wæver, Barry Buzan, Morten Kelstrup and Pierre Lemaitre, *Identity, Migr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3。

③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④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王振西主译：《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⑤ Levitt Peggy and Jaworsky B. Nadya,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3, No. 1, 2007, pp. 129-156.

成具有多元性、重构性和动态性的特点。^①移民的认同并不依赖于某一国家的实体或局限于某一种族和文化的归属,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一种“既此又彼”的新范式。^②

第二种是促成人们实施“环流”行为的外在因素——政策(policy)。外在因素是指通过给予奖励、荣誉的方式或打造有利于人们工作、生活、发展的外部环境激发“环流”,这主要指一国的政策。然而长期以来,国际移民研究将国际人口流动看作是一个经济现象,^③忽略了政策和环境的重要性。西方的移民理论都认为国家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忽略了现代国家在国际移民中的建构性角色。^④而事实是,移民问题作为一个公共问题,直接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甚至有学者称“移民是政策的产物”。^⑤公共政策作为国家筛选移民数量、类型的调节器,是一个整体系统,需要配套机制和国家整体的战略支持。

第三种是具有主体间特性的驱动力,它是既可以影响内在因素又可改变外在因素的干预因素——国际形势(international situation)。干预因素是一种不可预测的驱动力,尽管无法直接对流动产生刺激作用,但可以通过对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来增加或减少移民“环流”的意愿。^⑥

总的来说,移民“环流”的基本动因机制模型(如图2)所包含的三种驱动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融相通、和合统一的有机整体。

① Schiller Glick Nina, Basch Linda and Blanc-Szanton Cristina,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645, No.1, 1992, pp. 1-24.

② 黛博拉·迈得森:《双重否定的修辞格——加拿大华裔离散文学》,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29-34页。

③ 戴长征、王海滨:《国际人口流动中的反恐问题探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8页。

④ 参见Joppke Christian,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⑤ 参见Kingsley Davis,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M.S. Teitelbaum and J.M. Winter, eds.,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9。

⑥ Robyn Iredale, “Balancing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Skilled Mi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O. Irena, eds., *World Migration 2005: Costs and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3, 2005, pp. 221-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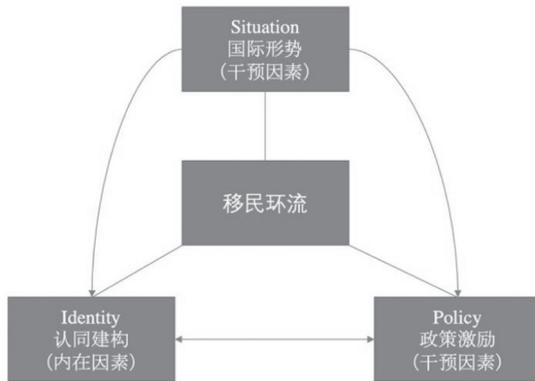


图2 移民“环流”的基本动因机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具体来讲，认同来自观念与制度两个方面。观念性认同指移民对迁入国的历史、风俗、文化、语言及价值观的欣赏与认可。它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影响移民的流动：第一，促使移民迁移至与母国文化相似、语言相近的国家。例如，2015年在中国生活、工作的89万外国公民中绝大部分来自亚洲（78%），其中韩国人数最多，占来华国际移民总数的21%；^①2015年英国的新移民中来自印度和美国的移民数量分别占据第二、三位；2017年法国的新移民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前法属北非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三国。^②

第二，观念性认同可以促使在海外工作和学习的高素质人才重新回到自己原籍国工作或建立联系。移民选择“回流”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对祖国的思念、忠诚和报效祖国的愿望。^③因此，政府也常利用提高祖国在海外侨民中吸引力的方式促进“回流”。比如，为了充分发挥广大海外印度群体

^① 参见“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15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December, 2015,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docs/MigrationStockDocumentation_2015.pdf, 登录时间：2019年10月14日。

^② 参见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7*, Paris: OECD, 41st Edition, 2017, http://medienservicestelle.at/migration_bewegt/wp-content/uploads/2017/10/International_Migration_Outlook_2017.pdf, 登录时间：2019年10月14日。

^③ 吴前进：《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欧美学者的观点和贡献》，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64-72页。

在印度经济与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印度实施了系统的、以认同体系为核心的侨民战略。^①印度政府在2004年成立了海外印度人事务部，专门负责服务、制定与实施与侨民相关的政策和计划；2005年通过授予一些高技术海外印度人“海外印度公民身份”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2012年实施的“印度游学项目”，其目的是让更多的学生和青年学者有机会在印度短期访问和学习，以便了解印度文化和历史。近年来，海外印度人才“回流”比例不断增加，仅2009—2010年，每年都有6万左右专业人员从美国回到印度。^②以色列则通过公私部门合作的方式建立了多部门的“人才回流网络”，并于2011年开始实施“卓越研究中心项目”，以吸引世界顶级的研究者回国工作。以色列还通过大力开展各种文化交流项目和定期举办文化交流活动的方式来加强海外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文化认同。截至2009年，已经有来自52个国家的20多万犹太青年参加了以色列政府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98%的参与者表示该项目加强了自己对以色列的认同感。此外，以色列还通过建立世界犹太学会研究联合会、国际高校犹太文明教研中心等机构，以及资助全球研究犹太文化的专著和教材的出版等多种方式来推动犹太文化传统的传播。

第三，观念性认同有利于国家吸引更多的外来移民。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对外文化政策的国家之一，其目的在于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来培养世人对法国的喜爱和认同。^③德国的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等也都采取同样的方式来传播本国文化、增加本国文化的吸引力，通过提升本国的软实力吸引外来移民。美国也一直重视软实力构建和文化价值输出。1961年，美国成立了“和平队”，目的在于向海外民众展现美国社会的优良传统，宣传其核心的价值观念，赢得当地人民的好感。此外，美国还通过打造一流的教育质量增加对全球优秀移民的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的教育、文化等指标都居于全世界前列，^④因而成为全球高端移民迁移的首选目的国。

① 黄海刚：《散居者策略——人才环流背景下海外人才战略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教育研究》，2017年第9期，第55—62页。

② 张严冰、黄莺、司文：《印度吸引海外印度裔人才回流的措施和成效》，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1期，第1—8页。

③ 彭姝祎：《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欧洲化与认同问题》，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1期，第59—73页。

④ 参见 *The Soft Power 30 —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2018*, <https://portland-communications.com/publications/a-global-ranking-of-soft-power-2018/>,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9日。

制度性认同是指移民对一国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制度体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劳动力市场、社会环境等）的肯定与认可。^①一般而言，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能够推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有利于提升移民的归属感，促进移民融入社会。因此，倡导多元文化的国家更容易吸引国际移民，尤其是高素质移民。2018年盖洛普公司发布的“全球移民接纳指数”显示，世界上主要的移民目的国在这两个方面得分都较高，例如在接受调查的138个国家中，新西兰排名第二（8.25分），澳大利亚位居第七（7.98分），美国排名第九（7.86分）。^②

其次，自由竞争的经济体系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移民寻求工作机会，加快移民实现自我价值。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已经成为移民“回流”和“环流”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2007年中国海外留学生“回流”的比例是30.6%，而2016年“回流”的比例已经提高到了79.4%，其中，回国率在2013年达到了顶峰——有85.4%的海外留学生选择了归国。^③因此，一个国家或城市能否吸引大量优质的移民，与自身的历史、包容性、良好的国际联通性等因素紧密相关。^④

政策激励可以分为定向性和非定向性两类。定向性政策指政府以满足本国高技术人才紧缺的需求或实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为目的而开展的专门项目，比如中国的“千人计划外国专家项目”（2008年）、韩国的“智力回归500人计划”（2012年）、加拿大的“全球人才签证计划”（2016年）、新加坡的“能力转移计划”（2017年）、澳大利亚的“全球人才计划”和“南澳大利亚创新计划”（2018年）等。优惠的定向性政策和具有针对性的人才项目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吸引人才，发挥人才的集聚效应。以加拿大的“全球人才签证计划”为例，在计划实施一年后，多伦多53家科技公司反馈，它们中一半以上的外籍技工申请人数呈快速增长趋势，比2016年外籍技工申请人数

① 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载《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2-13页。

② 就138个国家而言，移民接纳平均指数为5.29分，冰岛对于移民的接受程度最高为8.26分。参见“Migration Policies, Attitudes in Sync Worldwide,” Gallup, https://news.gallup.com/poll/187856/migration-policies-attitudes-sync-worldwide.aspx?g_source=link_NEWSV9&g_medium=&g_campaign=item&g_content=Migration%2520Policies%2c%2520Attitudes%2520in%2520Syn%20c%2520Worldwide，登录时间：2019年12月9日。

③ 参见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6n/xwfb_160325/160325_mtb01/201603/t20160329_235747.html，登录时间：2019年10月12日。

④ 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30-45页。

增加了50%~100%，还有少数公司高达300%。^①

非定向性政策是指一国有利于人才流动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综合性的移民生态环境，包括移民签证制度、移民的基本权利、移民生活、居住环境等。现在，人才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才竞争不仅仅是单纯的薪酬待遇的比较，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人才发展环境的较量。关于如何构建健康的移民生态环境，如何更加长久地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本文这里主要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首先，宽松的签证制度可以有效地鼓励移民流动。^②许多高技术移民不愿意回国是因为他们担心签证的限制会导致其失去以前的文化、人际关系纽带等。^③为了吸引高技术人才，从而增加自身科研创新能力并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优势地位，美国在2001年出台了《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该法案放宽了外籍劳动力市场的准入，上调了“H1-B签证”数量的上限。为了促进留学生本土就业，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还在2011年扩大了可延长实习期限的外国留学生范围。

其次，优化移民的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国际移民的后顾之忧，是另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国际性城市之所以能成为人才、知识、资本、技术、信息与创新的流动和汇聚中心，就是因为它们大多建立了一个适应流动性的社会治理体系，^④包括建立国际社区，提供专门针对外籍人士的就业服务或指导，制定人性化的政策以解决移民的子女教育和落户问题等，从各方面消除移民工作、生活的障碍。这不仅促进了移民的融入，增强了移民的归属感，还可以真正实现国际移民的本土化，例如新加坡发展局和人力部在2008年成立了专门机构“联系新加坡”，赋予其专门吸引国际人才的职能。此外，在引进人才的同时，政府、私人企业和民间组织还可以共同组成“国民融合理事

① 参见《加拿大实施“全球人才签证计划”，科技人才增加》，新浪网，<http://edu.sina.com.cn/a/2018-04-08/doc-ifyvtxc9499745.shtml>，登录时间：2019年10月12日。

② Vertovec Steven, “Circular Migration: The Way Forward in Global Poli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2017, https://ora.ox.ac.uk/objects/uuid:384d9c36-cc2e-43c5-9048-2ea72f179342/download_file?file_format=pdf&safe_filename=WP4%2BCircular%2BMigration%2BPolicy.pdf&type_of_work=Working+paper，登录时间：2019年10月21日。

③ Parthasarathi Ashok, “Turning Brain Drain into Brain Circulation: Immigration Policies Can be A Ticket for Scientific Talent to Recirculate among Countries,” *IAEA Bulletin*, No. 48/I. 2006,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magazines/bulletin/bull48-1/48105396870.pdf>，登录时间：2019年10月21日。

④ 何雪松、袁园：《全球城市的流动性与社会治理》，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37-42页。

会”，以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并增进信任。总之，政府通过外在的政策激励提升移民内在的认同，成为一种更为持久的驱动力。

干预因素主要包括国际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全球性经济危机、世界格局的变化等。比如，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大大降低了美国民众对于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接纳度和包容度，而政府也开始重新调整移民准入政策和审核制度，不仅严发签证，而且加强材料审查力度，从而改变了移民流动的内外环境。但干预因素有时也会给“环流”带来正面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力，在各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日益发达的同时，政府日益重视移民和人才工作。建立健全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实施“人才签证”政策，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强调要“走人才引领发展道路”，这一系列举措为移民的流动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约有90万外国人在中国工作；2017年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达到48.92万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和世界主要的“人才环流”接受国。^①

总的来说，中观的政策环境需要与微观的个人认同互补，并共同融入宏观的国际环境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有内在规律的动态系统，促使移民“环流”。我们把这个内在、外在与干预因素三者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合有机系统称为IPIS (Identity-Policy-International Situation) 模型 (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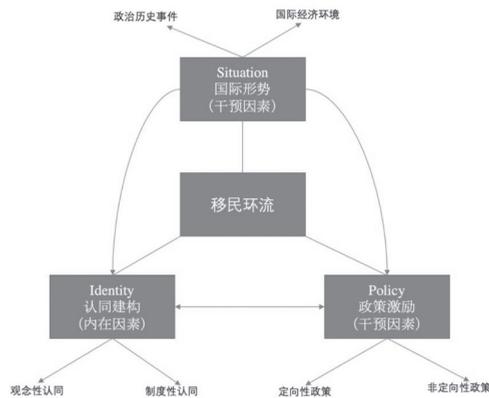


图3 “认同一政策—国际形势”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2016年度我国来华留学生情况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edu.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sjtj/201703/t20170301_297677.html，登录时间：2019年10月22日。

IPIS模型对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该模型将影响移民流动的内隐性认同和外显性政策动因进行定义与分类。这为各国制定或改进国际移民政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性指导。其次，该模型增加了干预变量，将移民的流动放置于宏观的国际环境中。干预变量的增加不仅使得移民动因系统更为完整，也为建立跨国人口流动共享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再次，IPIS模型建立了一个多维度、全方面的研究视角，将微观层面的个人认同、中观层面的国家政策以及宏观层面的国际环境的变迁都纳入移民的动力机制中，并强调了三者之间的交互性。在某种程度上，IPIS模型是对目前西方移民理论的一种整合与超越。

五、总结与反思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沟通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性的提高，人们的跨国迁移逐渐由单向、永久性的线形模式转为了循环往复的“环流”模式。尽管“环流”也会带来各种不同的社会问题，甚至从非传统安全角度看会带来除了“日常安全威胁”之外的“超常安全威胁”（极端排外主义、种族激进主义等），^①但就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环流”已经是国际移民的一种新趋势，并正在成为实现移民各主体之间“优态共存”的新途径。

在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之际，尤其是在目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假想敌，想方设法对各类进入中国的人才进行限制与掣肘，并对中国进入美国的人才表现出极为排外（Xenophobia）的时期，新的环流流动理论的再建构对当前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国际人才流动机制的构建、经济发展的转型以及国家安全的维护都会带来一些重要启示。

首先，IPIS模型为我国充分利用全球化和国际移民的人才红利提供了具体的路径：一是增强本国软实力；二是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积极搭建国际平台来共享人力资源。对此，我们应当做到三管齐下，内外联动：在认同建构方面，我们需要提升我国的文化和制度吸引力；在政策激励方面，我们需要增强我国人才政策的针对性、精准性与有效性；在国际环境方面，我

^① Bello Valer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hy Prejudice Is A Global Security Threat*,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88-105.

们需要建构具有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人才环流”共享机制，以降低国际环境干预性因素对我国“人才环流”的负面影响。

其次，“环流”这一新的流动模式提供了一种互惠共赢的人力资本流动的分析视角。它跳出了过去人才“流失” (brain drain) 和人才“增益” (brain gain) 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强调人才自由的跨国循环流动可以带来多方受益的积极效果，即接受国可以通过“环流”弥补人才市场的不足，移民自身也可以通过“环流”提高自身能力，更重要的是输出国可以通过技术、知识和人才的“环流”扭转因高技术人才向外迁移而造成的不利局面。“人才环流”可以作为“人才流失”的一种补偿，也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因大规模的“人才流失”而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总的来看，相比其他迁移模式而言，“环流”成本低且形式灵活，更符合我国国情。鼓励海外移民一次性的“回流”或定居中国，反而使得人才丧失其优势，而保持“人才环流”状态则有利于海外人才利用其在居住国的经验和技术优势为我国服务。

(作者简介：章雅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重庆，400044；余潇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杭州，310058)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

(责任编辑：全楚利)

A Reconstruction of Immigrants' Motivation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Zhang Yadi Yu Xiaofeng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old paradigm of permanent migration settlement has been progressively giving way to temporary and circular migration since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 new paradigm of human mobility requires a new theory to understand its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orrow theories from anthropolo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ology, and public policy to construct an "IPIS Model," that is, the "Identity-Policy-International Situation Model," which includes intrinsic, extrinsic and intervening factors focusing on the root causes of brain circulation. This model can provide a guidance for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talent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alent Policy; Talent Security; Brain Circulation; Migration Management